

DOI:10.13397/j.cnki.fef.2021.03.002

新文科: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

——复旦大学教授谈新文科

陈周旺,段怀清,严 峰,孙向晨,田素华,苏耕欣,李宏图,张涛甫

编者按 2020年11月3日,教育部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它标志着我国高等学校新文科建设正式拉开序幕。新文科的内涵和外延究竟是怎样的?它对于构建世界水平、中国特色的文科人才培养体系究竟有何意义?如何遵循教育规律有效地推进新文科建设?这些都是我们不能不深入思考的问题。复旦大学本科生院组织文科院系的教授们进行了专题研讨,在此基础上本刊约请教授们笔谈,以期能够引起学术界更广泛的关注和更深入的讨论。

New Liberal Arts: Academic System, Disciplinary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Perspectives of Professors from Fudan University

CHEN Zhouwang, DUAN Huaiqing, YAN Feng, SUN Xiangchen,

TIAN Suhua, SU Gengxin, LI Hongtu, ZHANG Taofu

Editor's Notes: The issuance of the Declara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n November 3, 2020 marked the prelud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in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What are the connotation and denota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What are the implications of new liberal ar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world-class talent cultiva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liberal arts? How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by following the laws of education? These questions deserve our in-depth thinking. Based on a symposium on new liberal arts organized by Fudan College, we invited professors from schools and departments of liberal arts to join our written discussion on this topic, in hopes of drawing greater attention and sparking deeper discussions in academic circles.

新文科建设对于中国政治学是一个契机

陈周旺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时代变革呼唤新政治学。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不能没有政治学的参与。由于没有中国自己的政治学,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走了不少弯路。邓小平同志的“8·18”讲话为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小平同志还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

紧补课。”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下,1981年政治学专业恢复招收本科生。专业重建之初,百废待兴。前辈政治学者开创性地设置了政治学原理、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比较政治制度、中国政治与社会等专业课程,满足了学生学习政治学理论、了解中国和世界政治的知识渴求,逐渐开发了本土化政治学教材,包括《政治

学概要》《政治的逻辑》《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比较政治制度》等。40年来,政治学专业为各条战线培养了众多国家建设人才。可以说,中国的政治学始终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行,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缩影。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有新的中国政治学。一个强大的中国,不仅要有先进的理工科,也要有底蕴深厚的人文社会科学。习近平同志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我们需要文化的传承、观念的传播,也需要向世界发出我们的声音。只有发展出自己的人生社会科学,形成对人类社会规律的认识和理解,建构出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才能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于政治学而言更是如此。真正的强国,都拥有独特的政治思想体系。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政治学,只能拾人牙慧,哪怕经济再发达,政治上也只能充当别国的战略附庸和传声筒。当今世界那些所谓“共同价值观”国家不都是这样么?

新文科建设对于中国政治学是一个契机,可以让我们检视曾经走过的路,反思我们到底存在哪些不足,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不得不说,近年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确实遇到了一些瓶颈,有一些高校还直接取消了政治学专业。几年前我就对政治学学科的发展提出了三个担忧:一是政治学自我设限,退缩为单纯研究政治思想史;二是政治学的研究议题被公共管理所覆盖,政治学的学者都转到公共管理领域;三是政治学专业被其他貌似相近的学科所取代。这不是政治学一个学科之忧,而是社会之忧。贬低政治学,不会让我们对政治的认识更加高明。最近几年,因为世界政治形势的变化,人民群众对政治学的需求与日俱增。人民群众日常关心的、讨论的,很多都是政治话题,但是政治学的发展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求。对政治感兴趣的大有人在,对政治学感兴趣的却寥寥无几,说明我们提供的“产品”确实有不足之处。如果我们不能“供给”更好的政治知识,人民群众对政治现象的理解就永远只能停留在人云亦云的水平,由一知半解的媒体来引领政治学话语。这不是一个理想的状况。

新政治学的目标,是建立中国自己的政治学理论话语体系,以理论创新引领专业教学,培养更多

具有全球视野、国家意识和时代精神的人才,真正做到为国育才、卓越为公。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不仅在理论上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做系统的、有效的、科学的阐释和理解,更重要的是在教学环节,让我们的理论成为可传播的知识,把政治学的知识讲准、讲透。

政治学专业的特点,就在于研究和教学须臾不可分。建设中国政治学理论知识体系,是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方向,同时也是政治学专业教学和人才培养的基础。现在世界上存在一种被商业逻辑所支配的学统,重发表不重学术,重科研不重教学,收益至上,把大学办成了企业。这种模式对政治学之类的人文社会科学是致命的,中国政治学不可复制之。否则的话,我们很多重要的理论知识,可能就会失去传承。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中国政治制度、比较政治制度、政府机构职能这样的研究领域,对于我们的教学和知识传承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由于不是热点话题,如今已经很难在期刊上发表科研成果,如果不通过新的人才评价标准来给予保护,恐怕难以为继,长此以往终将波及政治学研究本身,使之成为无根之学。

新时代政治学不能做旁观者。政治学者应以天下为己任,好生沉淀自己,做到陈言务去、返本开新。过去我们十分关心国外“前沿”,然而很多研究议题都是别人的关切,如利益集团、助选催票等,根本不是中国政治学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如果不从现实需要出发,形成自己的问题意识,研究之路就很容易走偏。可以说,什么时候中国的政治学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什么时候中国在内政外交上也就走向了真正的成熟。有鉴于此,我就自己对新政治学的理解提出四点认识。

第一,它是新的,也是“旧”的。人文科学和理工科不一样,不存在范式转换,新与旧之间很难截然区分和取舍。新与旧不取决于线性时间的先后,那些看起来旧的往往可能是新的。更何况,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新与旧之间一定要有传承,还有历久常新的呢。市面上流行的某些研究在技术上貌似新奇,选题却一味跟风,文字味同嚼蜡。新政治学之“新”,是在研究思维和教学行动上,能够始终保持原创冲动、敢于打破条条框框,在学术研究和日常教学中,时刻反思自己的问题,寻找新的理论突破口。因此,新旧之别,在思维模式,在行动落实,而不是其他流于表面的所谓创新。

第二,它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做中国的政治学,不等于要回到闭关锁国自己搞一套的状态,那样做不出好的政治学。这个亏我们已经吃过了。要知道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国要参与世界政治,跟其他民族交往,就要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也要让世界理解自己。政治学的目的不就是这个吗?倘若关起门来,那还要政治学做什么呢?我们倡导的中国政治学是一种方法论,也就是说,要立足于中国自身的实践、从问题出发来思考政治。不经反思,把别人的概念、理论拿来就用,那是懒人学问。过去恰逢学科创建之初,缺乏自己的理论体系,只能借鉴已有的模式来建设,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也是时至今日应总结的历史教训。我们也应该有充分的自信,把我们对政治的理解,放到一个世界的大平台中来检验、来对话,也让别人来学习和理解。

第三,它是学术的,而非口号的。政治学首先是一门科学,而且是一门关于人的科学。人是复杂的,对政治的理解也是多样化的,有它的复杂性。政治学比之学风空疏的口号式研究,更加注重学理上的分析。如果不把科学道理讲透,就没有办法产生知识传播效果。新文科建设要特别注重学风建设,政治学把学问做扎实了,就不担心被假大空的口号式研究钻空子。政治学要加强自己的梯队建设和人才培养,特别要注重理论素养的提升。当前最重要的教学任务是研读经典,特别是马克思主义

政治学经典,同时要引导学生深入中国社会、了解世界,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与世界、中国的政治现实相结合,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来分析政治现象。这种结合是复旦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最突出的理论优势和学术传统,在新文科建设中尤其要发扬这一传统。

第四,它是高远的,而非功利的。中国是一个大国,而且是一个历史悠远、文化持续的大国。大国的政治学和小国小城的政治学是不一样的。后者只要用高薪把一些顶尖学者吸引过来,凑在一起,就把学科建设起来了。这是品牌营销路数,可以短时间内提高大学排名,至于底蕴那是没有的。个别城市的大学,可以这样急功近利,但是对于背负传承大国文化、为国家发展培养建设人才使命的大国大学而言,是不合适的。大学要支撑国家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发展,必须要有足够深厚的学术沉淀,给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们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试想我们何不聘一批外国学者每年发一批英文文章,比几个本土学者苦苦写英文论文,不是更容易将指标搞上去吗?为什么我们非要培养本土的学者呢?因为我们需要的是大国的政治学、中国的政治学。

文以载道,在新的时代,新文科要承担新的历史使命。新政治学就是要有新的理论知识体系,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政治学人应以此共勉。

新文科的关键在于 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文科人才

段怀清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系主任、教授)

—

如果从晚清“西学东渐”以及“洋务运动”算起,由对新知识以及新人才的渴求激发出来的对于既有知识结构、人才标准、教育培养模式等展开的反思与改良,几乎贯穿了19世纪下半叶以及整个20世纪,并一直延续至今。曾有人言,“三千年后数人才,未知变局由此开”。这一诗句中并没有直接提“西学”与“新

学”,而从人才的评价、选拔标准及教育培养体制的改变角度立论,显示出诗人宏阔的视野,以及富于前瞻性的历史与现实洞察力。

某种程度上,今天的中国教育,仍处于这一百余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之中。所不同者,就是今天的新文科,已经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自我调整,并初步具备了从追随模仿式的“世界化”到自我主张式的“世界化”的基本条件,这也是我们今天从理论与实践两个

层面讨论并探索新文科所必须首先弄清楚的历史背景与现实处境。

实际上,自晚清“西学东渐”肇始,对于传统教育尤其是科举考试制度的反思、质疑和批判的声音即不绝于耳,其中焦点之一,就是科举考试制度作为一种知识制度、教育制度和人才选拔制度的三合一体制,已经严重阻碍了多样化人才、实用型人才和急需型人才的选拔。基于这样的考量与判断,晚清“洋务运动”的表象为近代军事、实业的建设推进,关键则是对于已经存在了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制度的初步调整和改良。作为这一调整与改良的探索之一,就是在语言、知识方面的“双轨制”尝试,具体而言,也就是晚清新式学堂的实验。值得注意的是,晚清新式学堂乃至学校的出现,并不是要从根本上替代或取消传统官学、私塾、书院以及科举考试制度,而是作为这种知识制度、教育制度和人才选拔制度的补充。也就是说,晚清新式学堂的推行,至少在最初的制度设计层面,其考量在救急,而不是从根本上调整、改变科举考试制度。

尽管如此,这种应急式的制度改良,为晚清“西学”以及“新学”的进一步传播、推广,提供了来自本土官方的制度性支持与保障。越来越多的本土青年学生,开始脱离本土固有教育培养模式,进入到新式学堂,接受至少在当时被视之为“新的”知识教育和培养。1898年,鲁迅离开他的家乡浙江绍兴,入读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后又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并由此开启了他“走异路,到异乡,寻找别样的人生”的现实探索。很显然,鲁迅当时的探索与选择,是在晚清中国教育已经初步展开的体制性改良及初步形成的探索成果之中完成的,而这一探索与选择本身,就包含并体现了晚清教育改良在知识体系、培养模式以及人才评估标准诸方面所取得的阶段性进展。当然,这样的进展在鲁迅这样的时代先锋看来,还远远不能满足时代青年对于新知识、新思想以及新文化的渴求。

晚清三十余年的教育双轨探索,在壬寅学制(1902年)、癸卯学制(1904年)两个新学制的制定与颁行后基本上被终止了。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晚清教育改革进入到一个更为广泛亦更为深入的调整变革时期,其中标志之一,就是晚清“西学东渐”以及“洋务运动”中所推行的教育双轨制,因为上述两个新学制的颁行以及1905年科举考试制度的废止而最终走到了尽头。

20世纪初期颁行的两个新学制以及科举考试制度的废止,给延续了一两千年的中国传统教育带来了

前所未有之冲击与挑战。首当其冲的,不仅是作为这一教育制度的核心支撑的儒家思想与价值,还有以儒家思想与价值为信仰的人才标准——自从科举考试制度设立以来,这一制度就是将知识确立与传承、教育培养模式以及人才评价标准整合在一起的。而这一制度的废止,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与这一制度密切相关的知识确立与传承、教育培养模式以及人才评价标准的分崩离析或碎片化,失去了其在新的体制内以一种完整的结构存在并发挥效能的现实基础。

真正对上述制度性调整和变革带来更大一击的,是1911年的帝制废止与蔡元培所主持修订并颁行的壬子癸丑学制(1912-1913年)。相较于之前的两个新学制,该学制有两条规定或改革影响深远:其一是废除尊孔读经;其二是进一步充实提升自然科学教育。这两点其实都与20世纪中国学科教育中的“文科”教育关系密切。如果说后者进一步强调并突出了自然科学知识及教育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进一步调整了晚清以来西学、新学以及传统知识学问三者之间的比重,进一步明确了自然科学知识在现代知识体系与结构中的地位与分量,从而对现代高等教育所着力培养的人才之知识结构与知识体系的现代性不仅提出了明确的设计要求,同时也从教育实践层面展开了落实,那么尊孔读经的废除,则对现代知识分子的知识信仰、文化身份乃至价值选择与人生追求等,进行了全新的设计。文史哲三科对于传统经学的“三分”,以及自然科学教育的高度重视,从两个不同方向或角度,显然进一步松弛了中国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之间的内在与外在关联。就此而言,蔡元培所推行的上述教育改制,才算真正从制度层面将晚清以来中国的教育改良,带入到现代教育的语境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上述学制改革的推行,晚清以降因应“西学”而提出的知识、教育及人才标准,亦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明体达用”的制度设计,逐渐为“商量旧学、培养新知”以及“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一类的倡导所替代。在这一系列的持续调整、改良、变革之中,最为核心的关切其实始终是“人才”,亦即需要和造就什么样的人。对于人才的认知、评判与需求,反过来必然影响到对于人才的知识结构、教育培养模式以及评价标准体系的改革,而不是相反。

二

鉴于此,这一轮新文科的倡导与教改,关键并不

在“新”,甚至也不仅仅是“新文科”,而是要弄清楚当前乃至未来一个较长时期内,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文科人才。只有弄清楚了文科人才或者新人才的目标导向和评价标准,并确立了这样的人才与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及未来需求之间的各种关系,甚至与中国进一步的世界化的历史进程之间的各种关系,我们所制定的新文科教改才能有明确而坚实的基础,才能有切实可行的目标,才能最大限度地得到广大师生的认同与支持,才能将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样的世纪性追求更为稳健地推向前进。

如果说晚清以及民国初期的学制改革更多还是着力于文科与理工科之间关系与地位的调整,并在传统文科与现代文科的视域中对“文科”的内涵、外延进行相关持续的调整,进入现代之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的急迫而旺盛的现实需求一直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延续至今的教育改革(包括文科教改)的重要驱动力。在这一驱动力之下,无论是高校扩招、拔尖人才培养还是国际化培养等政策举措,都能够找到现实、合理的解释。

问题在于,这种长期的、由外在的社会现实需求引导和推动的教育改革与教学改革,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忽略知识、学科、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也就是说,基础性研究的长期性、自在性,以及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的自在规律,有可能会在这种对于人才的迫切需求中不时被遮蔽或忽略。这种现象所造成的后果,就是对人才结构、人才现状以及人才未来的政策性、制度性调整和改革会受到阶段性、过渡性条件下所形成的人才观与人才战略的过多、过大影响。

显而易见,在这一轮新文科教改当中,在依然迫在眉睫的人才需求现状尚未得到根本缓解的情况下,

以人才为导向的学科调整与学科改革,包括新文科改革,无疑仍然具有现实必要性与合理性。这样的需求,也需要教育部门尤其是人才培养部门正面回应并切实找到落实的办法和措施。此外,应该重新在世界化的语境中反思并明确中国当代高等教育的“自我主张”,也就是当代教育的自我性与自主性,并由此逐步建立起真正能够长期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学术和文化发展以及社会文明进步的新文科教育与建设体系。

要实现上述目标,一方面依然要维持人才培养、教育改革、新文科建设与时代及社会的现实需求之间的关联互动,更积极、更紧密地参与到经济、社会、文化的建设之中,与此同时,也需要真正弄清楚新文科教改中知识的、学科的、学术的内在逻辑与学理支撑。这一内在逻辑与学理支撑,应该才是新文科发展与建构的最根本且更持久的力量所在。

这就提醒并要求我们,一方面需要弄明白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教育改革以人才需求为导向的历史原因,另一方面也需要想清楚,我们是否也需要适时跳出历史的延续与惯性,在一个更开阔、更具有超越性的视域和语境中,重新思考近现代以来文科、新文科发展建设的成就与现状,从知识、教育、学术、人才的结构关系中,重新设计、确立各结构要素之间的位置与关系。

具体而言,我们需要在新文科的语境中,在一种相对宽松从容的条件下,真正推进有关拔尖人才教育规律、培养模式以及评估机制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人类社会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的进步探索真正具有创新性的新文科教改思路与方案。

新文科建设应着力建构中国话语体系

严 峰

(复旦大学出版社党委书记、董事长)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文科来自西方。改革开放后,学科开始恢复,有些学科重新设置,除中文、中国哲学等少数学科外,大部分文科都走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特别是近20年,随着海归人才的不断引进,西方文科的研究范式、评价标准、教学模式逐步成为一些

学科的主流,文科对西方的学科依赖度普遍较高。其中,社会科学尤其如此,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很多学科走的基本都是引进的路线。这些学科的理论体系主要来自西方,体现在教学上,相当一批课程,包括主干课程,很多使用国外教材,主要理论和观点都

是西方学者创造的。有位经济学者曾说,现在上关于中国经济的课程,选用的还是美国教材,因为美国的相关研究比我们更深入,这的确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固然要承认研究的差距,但又如何去尽快缩短这样的差距?研究方法同样也跟随西方模式,主要体现在重量化、重技术、重微观。这些研究范式的引进,对改变国内原本以宏观理论为主的研究方式有很大帮助,但是,过度强调量化研究、强调研究方式的技术性,又逐步暴露出文科在宏观研究上的不足。对于国家急需的战略研究、政策研究、问题研究支撑不够,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用西方的理论、视角、方法来解释已经显得捉襟见肘。

任何国家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一定是基于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人文社会科学得以生长繁荣。尽管研究的范式、方法可以学习借鉴,但是相比理工科,文科的社会关联度要密切得多,扎根本土的理论视角不可或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借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问题、中国现象总是感觉不能完全到位,不能完全解释得清。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自己的理论建树,人文社科研究和教学光靠引进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的文科必须走引进、吸收、消化、结合自身实际创新的道路,逐步探索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研究范式、观察视角、教学方式,结合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的社会实践,建设自己的话语体系,这应该是新文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发展面临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也面临越来越复杂的国际竞争、交流、沟通和对抗。我们迫切感到,目前的国际交往中,中国的声音还相对较弱,在各类国际媒体、国际组织、国际机构中,我们的话语权还不够,我们的议题设置能力还不强,我们的理念、目标、做法还需要更好的宣传渠道,取得更广泛的共识。国家急需一大批熟悉国情、了解国家政策、具有全球视野、熟悉国际规则的人才,更需要参与全球治理,参与国际对话,推动“走出去”战略,这些需求与新文科建设都密切相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经过40年的重新起步、学习、引进、艰苦追赶,已经到了应该逐步有自己的研究理论、研究方法、研究视角,逐步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为世界的人文社科研究做出我们的

贡献的时候了。

文科话语体系的建立,首先要重视在引进的基础上,创新建立自己的学科理论基础。只有立足中国的研究才能真正解释中国问题,才能真正与世界对话。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巨大成功是最好的范例,证明我们完全有能力学习、吸收先进理论,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创新,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体系。以此为基点,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对世界问题提出我们的观点和解释,从中国的视角提出全球治理的理念和策略。西方理论再好,也是基于西方的社会实践产生的,直接拿来解释中国问题肯定行不通;用来解释世界问题,也未必能超过理论原创者,掌握话语权更是遥遥无期。

其次,话语体系的建立离不开有效的对外交流。建设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绝不意味着闭关锁国、自我封闭。话语体系的建构建立在共同认知的基础上。要取得这些共识,与世界各国高校之间的交流,学者之间的交流,社会各类文化平台、机构的交流,各类国际机构和组织的参与,都十分重要。最近,复旦大学计划在布达佩斯开办大学,为国内高校与欧洲大学的交流搭建平台,就是非常有益的尝试。随着中国的崛起,这种交流的意愿并不是中国单方面的。在埃及最大的大学之一——艾因霍姆斯大学,学习中文的学生达1000人,很多学生能讲流利的中文。这些国家和地区非常期待与中国的交流。

第三,高校新文科话语体系的建构,教材建设应作为重中之重。教材建设这些年在高校一直不被重视,论文导向的评价政策使编写教材成为边缘化的研究工作。而事实上,教材恰恰是影响学生的关键因素之一。教材反映了学科的研究精髓,代表了学科发展的综合水准。唯有从教材入手,大力推进自主教材建设和创新,才能奠定话语体系的基石。教材建设既能大力推动结合中国发展实际的理论研究,逐步建立起学科领域的理论体系,也能锻炼学术团队,逐步发挥中国学术的影响力。复旦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比较政治学》是国内第一部相关领域的学术专著和教材。该书由复旦大学政治学研究团队领衔,汇集了国内10所高校19名中青年学者的学术成果,填补了国内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这些学者的愿景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建设自己的教材,在比较政治研究领域做出中国学者的贡献。值得欣喜的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共识。

笔者认为,文科话语体系的建设,高校出版社应

该积极参与,并且大有可为。我们看到,国外很多经典教材都是经过多年、多次的修订再版,逐步成为经典,比如《社会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社会调查方法》等。这些教材的建设,需要作者团队和出版团队数十年的共同努力与合作。我们认为,衡量一个学科是否真正有影响力,最过硬的指标就是这个学科编写的教材在全国乃至全球有多少学校使用。当年蒋学模先生的《政治经济学》几乎每个学生都读过,奠定了蒋学模先生在这个领域不可动摇的学术地位,这样的话语权是不需要什么排名来佐证的。就文科而言,这样的经典教材有,但还太少,需要政策导向的调整,需要学科团队的投入,也需要出版单位的持续参与。出版社对教材的市场反应更加直接和灵敏,可以及时反馈教材使用情况,促使教材不断完善。

第四,期刊建设是话语体系建构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这同样也跟出版密不可分。对于文科研究来说,学术论文、期刊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国外很多著名出版社就是以期刊数据库为主打产品,如爱思唯尔、斯普林格、威利等。国内文科期刊数量众多,但是

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还很少,主要原因在于国内文科期刊的建设相对比较分散,平台化、集约化、数字化出版相对较弱,另外语言也是一个障碍。近年来,国家已经开始加强高水平期刊的布局和建设,其主要目的也是论文发表的话语体系建设。一个比较有利的趋势是,近年来线上发表、开放获取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可,通过线上发表的形式,学术研究成果更容易走向国门、为国际学术界所认识。一些出版社已经开始投入相关平台建设,如复旦新学术网。通过网络期刊建设,可以有效地发挥集约优势,集成学术资源,促进学术共享,扩大国际影响力,进而推动自身话语体系的建设。

文科,归根到底是关于人的学科,是关于文化和价值观的学科,是关于国家、社会、组织的学科。文科应该在社会发展中起到引领作用,中国也有义务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这种引领,归根到底就是话语权和影响力,这也正是新文科的重要使命。我们相信,随着新文科改革的推进,话语体系建构的意义一定会越来越突显。

浅谈以“哲学+”为核心的新文科人才培养

孙向晨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教授)

2020年11月3日,教育部在山东大学(威海)召开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引起学界很大关注。新文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很多方面、很多层次,与哲学学科相关的新文科建设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究竟怎么来理解这个问题?究竟怎么来培养相关的新文科人才?在这里谈一些粗浅看法。

一、哲学学科的独特性与新文科建设

哲学在整个现代学科体系中的地位有点特殊,它不仅仅是一个研究的领域,更是研究问题的一个层面。因此,它可以加在任何一个学科之上,而不会有违和之感。就三大学科领域而言,人文学科有艺术、语言、文学与历史等,社会科学有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自然科学有数学、物理、化学与生物学,所有这些学科各自加上“哲学”二字都是顺理成章的,甚至医

学、管理学、教育学、体育学也都有医学哲学、管理哲学、教育哲学、体育哲学等。而各种新兴技术也都可以冠之以“哲学”二字,如人工智能哲学、大数据哲学等。把“哲学”仅仅算作是传统的人文学科似乎是不太确切的,早年很多哲学家也都是自然科学家,如笛卡尔、帕斯卡、莱布尼茨、牛顿、罗素、弗雷格等人。在哲学中,始终有很强的自然科学的思考面向,以致很多哲学系老师并不认为自己属于纯粹的人文学科。新文科建设,尤其是新文科所注重的跨学科建设,可以顺势把“哲学”学科的这一独特性彻底发挥出来,打破原有对于哲学的固化印象,打破局限于人文专业的哲学培养模式,真正顺应哲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为人类培养跨学科的创新人才。哲学学科作为新文科建设的关键领域之一,在跨学科人才培养上有着明显的独到优势。希望借助新文科建设,真正发挥哲学的这种跨学科优势,为中国的哲学类跨学科人才培养摸索

出成熟的道路。

二、哲学+ 在新文科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

对于哲学的这一跨学科的独特性,我们用“哲学+”的概念加以概括。在新文科建设中,“哲学+”的理念以及培养模式将会得到很大的发扬,因为它在诸个层面都符合哲学以及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规律。

就哲学学科的发展规律而言,跨学科的深度融通是哲学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是新文科建设的重要改革方向。正如前文所言,哲学学科的发展天然地具有跨学科的色彩,任何基础学科在深层次上的思考都会涉及哲学问题,以至于理论学科的博士学位都叫Ph.D.。然而,在现有的学科格局下,哲学学科的这一特性并未充分地显露出来,缺乏应有的体制与机制的保障。更多的时候,哲学只是作为人文学科而存在于现有的学科体制内,哲学自身的创造性以及人才培养的多样性都没有得到展开。新文科建设为哲学这一跨学科特质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以新文科建设的“守正创新”为目标,在做好传统哲学学科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可以对经济、政治、法学、物理、医学、生物、艺术等领域的“哲学+”进行深入探索,使之成为国内哲学学科未来发展的一大创新与亮点。

就哲学人才的培养规律而言,“哲学+”是国际顶尖哲学学科人才培养的成熟方式,借鉴相关经验可以有助于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人才培养模式。“哲学+”的培养理念始终是国际顶尖哲学学科培养人才的优先选择。例如,在牛津大学,所有本科层面的哲学项目都是以“哲学+”形式来设立的,如“哲学+物理”(PP)、“哲学+计算机”(PC)、“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PPE)、“哲学+政治学与法学”(PPL)。全球有超过130所大学开设PPE专业,包括牛津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耶鲁大学等国际一流学府。此外,还有“哲学+物理”(PP)、“哲学+医学”(PM)等项目也为牛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等多所世界名校所开展。“哲学+”的模式突破了传统的“philosophy of”的模式,不是以哲学去涵摄具体学科,而是让哲学的思考与具体学科在培养人才的实践过程中实际地面对面。在这方面,应该充分借鉴国外顶尖大学开展“哲学+”人才培养的经验,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人才培养模式。

就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而言,建立“哲学+”跨学科的学程、专业方向以及跨学科专业的培养模式,是解

决当前哲学跨学科人才培养短板的有力举措。“哲学+”的人才培养模式并不是单一的、固化的,而是有着多层次的结合。它不仅可以和很多学科相结合来开展研究,还可以在学程、学科内部以及跨院系的多学科专业组合三个层面上来展开。“哲学+”的多层次培养模式可以突破分专业教学带来的单一化的理论限制与思维局限,整合多个优势基础学科之间的教学与科研力量,培养出文理专业基础雄厚、创新能力突出、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一流人才。

三、哲学+ 培养理念的提出与实施

复旦哲学学院在考察了国际哲学界人才培养的先进经验之后,2012年在全国率先提出“哲学+”的人才培养理念,作为哲学专业拔尖人才培养以及高水平综合性人才培养的发展方向。经过多年的实践与摸索,大致在三个层面推进了“哲学+”跨学科人才的培养。在学程(program)层面:2018年设立了“数理逻辑+数学+计算机”(PMC)学程项目,该项目面向全校的文理学生,在学程这一较小的规模上,通过逻辑上的关联把数理逻辑、数学基础与计算机应用逻辑结合起来,为学生提供数理逻辑方面的系统训练。在专业方向层面:2008年哲学学院设立了“中国哲学+古典学”本科生项目,俗称“国学班”项目;2019年成立了科学哲学与逻辑学系,2020年成立了艺术哲学系,并分别建设了具有跨学科性质的“科学哲学与逻辑学”与“艺术哲学”两个哲学专业方向;这些内容都属于哲学的专业方向,都是以哲学为主,同时延伸到具体的学科方向,从而激活哲学自身的活力。在跨院系的跨学科专业层面:2020年牵头推进的“哲学+政治+经济”(PPE)项目目前已经筹建完成,将于2021年招生。此外,复旦哲学学院还试图推进其他一些多学科的人才培养项目。这些项目的特点在于并不以哲学为核心,而是多学科的一种组合。复旦大学还成立了生命医学伦理中心、智能科学与智能哲学研究中心、科技伦理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现代艺术哲学研究中心等跨学科的研究中心,通过这些跨学科研究平台支撑起跨学科人才培养项目。复旦哲学学院一直在努力打破学科间的专业壁垒,逐步展开与物理学、数学、生命科学、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学科的深入对话,推动哲学与其他一级学科之间的跨学科合作取得良好进展。

四、哲学+ 人才培养的建设思路

多年来,复旦哲学学院一直在探索“哲学+”的跨

学科人才培养模式,建立起以“哲学+”为核心的跨学科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在这方面积累了初步的经验。希望借此新文科建设的契机,进一步探索哲学跨学科人才培养的规律,借鉴国际上跨学科人才培养的成熟经验,形成各跨学科专业培养的成熟方案;同时努力做好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的衔接工作,形成完善的人才培养规划,为中国哲学界跨学科人才培养提供范本。未来将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探索跨学科人才培养的规律与特点,试点推进各层面的跨学科项目。

1. 哲学+ 的跨学科课程项目

面向全校所有本科生推出有针对性的“哲学+”课程项目。除了目前联合数学学院、计算机学院展开的“数理逻辑+数学+计算机”(PMC)课程项目外,未来计划重点打造“应用伦理+”“哲学+艺术”“哲学+人工智能”等方面的课程项目,为各个学科有志于哲学层面思考的同学提供相应的学术路径。

2. 哲学学院内部 哲学+ 专业方向的设计

推动以本专业为基础的“哲学+”跨学科的哲学专业方向。复旦哲学学院目前已经建成哲学、宗教学、国学班、科学哲学与逻辑学、艺术哲学五大学科集群的发展架构。学科结构更加合理,更加尊重学科自身的规律,打破了二级学科间的壁垒,推动了学科内部的融合与发展。

2008年,复旦哲学学院在国内较早建立了“国学班”,经过13年的努力和积累,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发展思路。“国学班”借鉴中国传统“文史哲不分家”和西方古典学人才培养的基本理念,要求学生具有坚实的国学基础知识和较高的古汉语素养,在熟读中国传统经典的同时,具有西方哲学和中西思想交融的跨学科知识背景,强调文本研究与理论思辨并举,并形成“中国哲学+古典学”的学科特点。2018年,复旦哲学学院成立了国内首家科学哲学与逻辑学系,受到国内外同行的广泛好评。该学科致力于发展以多学科、跨学科为特征的“哲学+科学”的培养模式,目前有科学哲学与逻辑学两个专业方向,强调哲学与具体学科的结合,使哲学有能力面对现代社会最为活跃的科技领域来进行深层次的思考。

2020年,复旦哲学学院成立了国内首家艺术哲学系,以“哲学+艺术”为人才培养理念,使哲学深入艺术现场,同时积极探索艺术哲学领域“校-馆”合作的艺术人才培养新模式。目前该系与上海博物馆、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复星艺术中心等机构有了深入合作,形成了艺术哲学专业方向的培养方案,同时通过艺术

理论高级研讨班、高端艺术理论人才实训基地等多种形式培养当前艺术领域最为紧缺的理论和策展人才。

3. 在跨专业、跨院系领域推动 哲学+ 专业的设立和人才培养

除了“哲学+”的跨学科课程与专业方向,“哲学+”跨学科培养更为高级的版本应该是通过多学科的有机组合,真正培养出有哲学素养的复合型人才。目前的计划如下:

PPE项目:与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经济学院合作筹建“哲学+政治+经济”(PPE)本科专业。这是跨学科的本科专业,目前已经有了实质性的推进,即将进入招生阶段。

PP项目:与物理学系合作筹建“哲学+物理”(PP)本科专业。已经赴国外相关院系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完成了考察报告,为未来的实施做好了理论的铺垫。

PM项目:与医学院合作筹建“哲学+医学伦理”(PM)硕士专业。这一项目有着广泛的社会需求,疫情期间曾与医学院的相关院系举行过多次网络会议,以期推进相关项目。

PPL项目:与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法学院合作筹建“哲学+政治+法律”(PPL)博士专业等。与法学院、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已经进行了初步的协商,希望能够筹建相关的博士项目,法学院也希望借此推进法学基础理论人才的培养。

五、哲学+ 人才培养的创新点与未来的挑战

“哲学+”的人才培养模式有着非常好的前景,但在与其他院系的合作中也遇到了一系列挑战。希望以新文科建设为契机,从理念的展开、培养的试点到模式的确立,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的创新来迎接各种挑战。

第一,以“哲学+”为人才培养理念。以“哲学+”为核心的跨学科人才培养理念为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新文科改革与实践提供了新的建设思路;同时,这一理念针对哲学学科如何在21世纪培养出适合时代需要的新型复合型人才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尽管如此,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理论建设,认真研究哲学学科在21世纪发展的基本特征与趋势,积极探索哲学与其他学科相结合的多元模式,并在跨学科人才培养的具体方案中体现出来,这将是新文科建设中非常重要的创新点。

第二,多层次展开“哲学+”跨学科人才培养试点。复旦哲学学院在现有的条件下,已经在学程、学科内

以及跨院系三个层面展开了“哲学+”跨学科人才培养的试点工作,在这一过程中充分展现出哲学学科自身的开放性与包容性。未来需要进一步细化这三个层面的“哲学+”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总结经验、创新机制,研究如何在哲学学科的培养体系中让拔尖学生能够横跨多个研究领域,这也将是创新发展的主要方向。

第三,多途径拓展“哲学+”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目前基础学科的学生培养方式大多以授课为主。跨学科的人才培养模式将更多地跨学科的导师制、跨院系的书院制、跨专业的国际合作以及学科交叉的社会实践方面做出更细致的探索,让学生的专业培养途径更为多样、方法更为多元,进一步增强文科基础学科在专业领域的国际竞争力。

新文科建设与经济学拔尖人才培养

田素华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人文科学具有时代性,体现的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目的的人文精神,对人类认识世界、开展社会实践具有指导和规范作用,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精神品质和思维能力的重要体现。新文科涵盖心理学、经济学、哲学、中国语言文学和历史学等学科。

一、发展新文科是时代的必然

当今时代不仅需要科学技术的创新,也需要思想文化的引领。发展新文科是加快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设的需要,也是为人工智能等科技发展保驾护航的需要。

(一)加快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设

我们现在的知识学科、专业体系和育人模式大多来自西方。西方发达国家现有的理论特别是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的发展事实。中国因为超越了西方国家现存的经济理论才有了现在的发展,但我们对发展经验的总结和理论构建还远远不够。

创造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意义的新方法和新范式,是新文科的重大使命。讲好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奇迹背后的原理和道理,有助于为世界知识界、思想界、学术界贡献学术新知,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为新一轮改革开放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理论支撑,需要新文科从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等角度加以解释。

(二)为科技发展保驾护航

历次科技革命和技术革命都带来了生产力革命,并带来了法律、文化、观念、秩序等精神和价值层面的

一系列深刻变化。移动互联网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治理方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法律、伦理和道德问题。这些问题已经超越单纯的技术问题,是人类社会从未涉足的深层次社会文化问题。

当人工智能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然需要人文科学的介入,以确保技术的发展不会偏离为人类服务的主旨,不会给人类文明带来本质性的困境或伤害。新文科建设可以起到保障人类对机器的情感设计遵循人类文明求真、向善、爱美之正确方向的作用。提供人文关怀,防止人类异化,让人类超越自身局限,需要新文科的启明。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在大力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生态、伦理等方面的风险。新文科的首要任务是引领社会价值观重塑,为理工科乃至国家和社会提供思想指引与价值选择。

二、新文科的跨学科协同发展

新文科建设要坚持问题导向,强调跨学科融合发展。新文科必须推动实质性学科交叉,进行跨界协同的复合型研究,进而创设新的学术领域。

(一)以问题为导向

一些纯学理层面的建议或结论,往往于现实无所裨益。新文科必须及时准确地回应时代之变,聚焦改革发展的突出问题,为分析现实问题建好基础理论框架。同时,要扎根一线,深入调研,提出更多接地气、见实效的对策;运用专业性的知识、方法和技术,在中国实践中形成中国理论,阐释和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

新文科需要关注时代的、民族的和人类的问题。新文科建设必须找到、找准与新时代文科发展不相适应的根本性、全局性问题,针对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生物伦理、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等带来的挑战探索新理论,推动文科研究领域向纵深拓展。

(二)立足跨学科发展

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实现学科交叉融合,就可以在理论和方法上实现突破。在这里,首先是文史哲等基础学科的融通,其次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融通,再次是人文社会科学和医学、生物科学、信息科学等学科的交叉融通。

文理交叉融合是人文学科拥抱新技术时代的必由之路。文理交叉融合包括人文助力科技和科技辅助人文两个方面。社会计算、金融科技、空间计量经济学、技术哲学、计算语言学等新兴文科专业的兴起,更加突出了新文科的综合性、跨学科、融通性的特征。推动文文、文理、文工交叉融通,用人文社会科学回应新技术出现的新问题,有助于借力新技术推进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借助现代科技重塑我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体系。

(三)构建全新的学术共同体

遵循学术发展的规律,构建新的学术共同体和共识,是推动新文科发展的重要方法。打破学科壁垒,搭建学科集群平台,有助于推进文科内部以及文科与理工科等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也有助于培植新兴学科、传承和发展传统学科的知识体系。

搭建跨学科交流平台,有助于由学科导向转为问题导向,形成优势学术集群。成立跨学科研究平台的重点是,立足国内外学科发展前沿,关注数字人文、社会计算、大数据治理等领域,通过资助跨学科研究项目,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特别是加强文科公共服务创新平台建设,通过夯实数据基础、工具基础、平台服务,驱动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发展。

(四)融入信息技术以实现方法创新

新文科发展不仅应关注知识和技能,更应关注思维和精神;不仅要关注智慧,更应走向智能。在方法论上,传统的人文社科应转向运用现代科技、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特别是要运用算法,将文科的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相统一,彰显新文科的科学性。推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文科专业嫁接,有助于运用新技术对传统文科(比如经济学)进行再发现、再解析。

“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是以引进新媒体、

算法和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来促进人文学科的全新发展。它以“人文”为目的,以“数字”为手段,目标是将各种数字信息技术广泛用于人文学科的知识生产、传播与教学当中,为传统人文学科的教学和研究提供方法和平台。数字人文从数据存储建设和编辑,到开展统计处理(计算机语言学)、运用链接(超文本)、建模(包括结构构建和视觉呈现)、创造结构化数据(可扩展标记语言),再到新的整合性实践,为新文科提供了新的研究工具。

三、新文科的评价体系

面对新文科的发展要求,需要减少绩效考核和发表论文等硬性要求;同时,适应新文科的发展,探索与交叉研究相适应的学术评价体系。我们需要突出评价成果质量和原创价值,以及建言资政和人才培养贡献度,探索将决策咨询、教学教研、课程思政等方面的高质量成果作为新文科代表性成果。我们需要根据不同类型成果的特点制定评价标准。对于基础类研究,注重标志性成果的贡献度和影响力,侧重评价其在推动理论创新和文明传承等方面的贡献。对于应用类研究,突出质量和效用导向,处理好学术性成果和智库性成果的关系,处理好独立研究成果与团队合作成果的关系。

对新文科专业的教育评价可逐渐打破传统的唯分数导向,开展多维度的教育评价,特别是结合新文科专业特色和课程体系,优化理论课程的考核内容及考核方式,对实践类课程实行校外企业评价与校内教师综合评价相结合。在突出对学生专业能力评价的同时,从课程教学、专业实践、阅读讨论、科学研究等角度实施全面评价。

四、经济学拔尖人才培养模式

新文科人才培养需要坚持立德树人,以培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为使命。以“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为指引,立足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伟大实践,构建具有世界水平、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对推动中国高等教育创新发展、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面对经济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崇高使命,我们急需搭建高效运转的教学平台,形成教师、学生、行政管理全覆盖的资源投入机制和激励机制。在围绕新文科理念培养经济学拔尖创新人才方面,我们需要对以下问题给出明确回答,并给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一) 培养目标

我们亟待明确新文科时代背景下的经济学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目标。新文科教育要注重健全的精神。健全的精神包括科学精神、人文精神、信仰精神。健全的精神高于科学知识、人文知识、智慧说教,包括质疑能力、关爱之心,以及对家庭、社区、国家、民族、文明、人类的使命感。新文科教育需要强化使命意识,应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通过学术卓越追求育人卓越。新文科建设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强化德育教育,实现超越知识点的传授,培养适应新时代国家社会发展要求和世界趋势的拔尖人才和卓越人才。

新文科旨在培养超越现有专业局限,专业素养高、学术能力精、综合实力强、有创造视野的新人才。新文科的卓越发展需要关注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思维基本要素训练不足,会导致人才在创造能力方面的缺陷,甚至人格和认知方面的缺陷。我们认为,经济学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目标是引导学生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学科前沿,投身经济学领域的科学研究,能够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提供思想指引、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二) 专业设置和培养方案

在市场化 and 金融热的社会大环境下,我们亟须构建将选拔和培养有机衔接的全链条育人机制。为了适应新文科的发展要求,需要构建新文科教学体系,加快新专业或新方向、新课程的探索与增设。可以开展本硕博长学制贯通式培养,推进双学位、主辅修等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构建跨院校、跨专业、跨行业、跨国界的协同育人机制。在课程体系方面,我们需要鼓励跨学院联合开设新课程和激励教师开发新课程,构建新旧课程相互衔接的课程体系。

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巨变和中国经济的崛起,在注重前沿理论和现代经济学方法教学的基础上,为了持续升级经济学拔尖人才培养质量,我们亟须全方位重建课程架构,通过优化学时学分特别是设立大学分课程,打造一批适应新文科理念的课程,形成“扎根中国实践、强化价值引领、夯实经济理论、加强方法训练、注重学科前沿交叉”的课程体系。

第一,将新业态需求的专业知识体系纳入专业课程体系。我们考虑增设数理经济学系列课程,同数学学院和大数据学院开展合作,开设机器学习、人工智

能等学科交叉课程。我们拟建设经济学实验课程,形成包括基础性实验、应用性实验等在内的经济学科多层次专业实验课程架构。

第二,将实践课程纳为核心课程,提高实践课程的课时及学分。我们认为,所有面向经济学拔尖计划的课程必须紧密结合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突出中国经济案例课程教学。我们拟专门搭建面向经济学拔尖学生的实习实践基地,规范和强化现有的经济学社会实践课程。鼓励教师将自己的科研工作引入课堂,实行校外导师制或聘请校外从业人员进入课堂,定期开展行业讲座及实践指导,并鼓励在校学生和教师进入企业进行实际的专业学习和技能输出。

第三,将价值观引导和课程思政教育元素嵌入并内化到每门专业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以培养学生坚定的理想信念、深厚的家国情怀以及追求卓越的奋斗精神。同时,增加经典文献阅读与写作课程,持续培养学生的文献阅读能力和学术论文撰写能力。

(三) 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新文科需要在教学内容上有所创新。所有的课程教学将被要求围绕经济学科发展前沿,采用期刊论文和最新研究报告等资料辅助课堂教学,同时设计带有探索性质的课程任务,引导学生深度参与经济学科前沿问题思考,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新文科要在教学方式上有所突破。除了板书外,需要将慕课、网络直播、微信群答疑互动、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等多种教学方式结合起来。我们鼓励教师积极引导深度参与课堂学习,丰富教学互动,把课堂从传授知识的场所转变成促进学生学习研究的场所。我们支持课程教学充分运用信息技术动态革新线下教学方法,加强慕课等网络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平台的建设。

虚拟现实技术是实现新文科教育信息化转型的重要手段。该技术的实质是“创造”出现实中并不存在的虚拟世界,其关键领域是动态建模和三维图形展示。我们需要建设面向经济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经济学实验教学中心,为实践教学提供物理空间,同时加强数据库外购和数据库自建工作,打造国家级经济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经济学模拟仿真教学中心。

新文科为深化外文专业改革提供了契机

苏耕欣

(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

虽然我们对于新文科诸方面的共识尚在形成之中,但就目前已经明确的目标而言,新文科为深化外文专业改革、使其进一步与世界主流大学接轨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新文科的目标之一是推进跨专业、跨学科门类的交叉融合,而这正是世界主流大学本科教学的通行做法。我国高校的外文专业过去在学术上较为封闭,与其他学科交流甚少,遑论融合。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外文专业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仅仅是一个外语培训机构,其教学与研究活动基本不涉及思想研究,与历史、哲学和中文等学科在学术层次上相去甚远,不可同日而语。改革开放尤其是21世纪以来,从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教师陆续进入国内一流大学的外文专业,他们将世界主流大学的思路和方法带入我国高校外文界。

由于长期以来外文院系的主要工作是外语培训,外文专业被认为是一个“没有专业的专业”,但在复旦的办学理念与世界主流大学逐渐接轨的今天,这一专业之问已非学科建设之核心。作为人文“重镇”,外文专业的培养目标应该是通识教育、素质教育,而不是职业培训。既然外文学科的办学目标不再是为某个或某些特定领域培养人才,所谓有无“专业”之说自然也不成立。实际上,对于绝大多数文科毕业生而言,如果不选择学术道路,他们所面对的行业都不存在理工科那样的专业门槛或壁垒,跨专业就业应该是司空见惯之事。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世界主流大学在本科教育阶段普遍实行“轻专业、重素质”的通识教育。它们并非不重视专业性训练,而是将这种更高层次的专业教育放在研究生阶段。其实,通识教育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与互补性,而本科阶段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在多个领域进行的基本功训练,能够为研究生阶段的专业学习打下扎实的基础。

那么,在新文科战略下,外文专业应该如何参与同其他文史哲领域的融合与交叉并从中获益?我认为,我们不应机械地理解跨专业、跨学科教学与研究,似乎两边各做一半或各沾一点,我们就跨学科了。我

们也不应该为跨而跨或为赶时髦而跨。比如,有人在外国文学领域研究“植物批评”,这就属于不务正业。所谓跨专业、跨学科研究与教学,并不是对原有专业或学科的否定或作根本性改变,而是立足于原有专业与学科,通过与其他领域的联系与交流,对原有领域进行补充与完善,使从业者能够获得原先无法获得的认识,完成原先无法完成的工作。在英国文学领域,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17世纪文学巨匠弥尔顿的史诗——《失乐园》。教师要讲授这部史诗、学生要读懂这部作品,必须掌握文学、历史、政治和宗教这几个学科的知识。首先当然是文学知识,其中包括史诗传统。其次是宗教知识,因为这部作品的内容本身就是讲撒旦如何引诱夏娃和亚当偷吃禁果并由此导致二者被逐出伊甸园的过程,而鉴于宗教与当时的英国政治与历史紧紧“纠缠”在一起,要真正理解这部史诗,必须对当时的社会历史、王权政治和宗教斗争有深刻的认识。弥尔顿声称作此史诗之目的是“昭示天道之公正”。表面上看,就是说亚当和夏娃被逐出天堂是咎由自取,人类应该“认罪服法”,而不能怪罪上帝、怨天尤人,而实际上,弥尔顿是在评论刚刚结束的英国内战(又称清教革命)。开始于17世纪40年代的革命最后以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而告终,清教徒的革命事业惨遭失败。对于深度涉入这场革命的弥尔顿而言,这个结果自然苦涩难尝,但他在失明后的漫长黑暗中苦苦思索后,认为人类的堕落是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我们不能诿过于上帝。在他看来,这种堕落本质在人间造成了混乱与冲突,导致人对人的奴役与压制,也是革命党人在杀死国王查尔斯一世后无法取得一致并最终使斯图亚特王朝得以乘乱复辟的根本原因。撇开具体的历史事件,在一个更为抽象的宗教神学层面,弥尔顿的这部史诗反映了西方文化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争论,即人类自由意志和命运预定论之间的矛盾。弥尔顿显然接受自由意志说,这一立场有别于多数清教徒接受的、来自卡尔文派教义的“得救预定论”。从上面的简单介绍我们便可看出《失乐园》这部作品在思想上如何深广,也可以此窥见17世纪新

教各派别之间的差别以及新教教义的复杂性和多样化特征。

不仅如此,《失乐园》这个例子还反映出“西学”知识各领域之间的紧密联系,而外文专业能够通过这种联系从学科交叉与融合中获益,是不言而喻的。过去外文专业只关注字句,涉猎思想者极少,其研究方法对于理解《失乐园》级别的作品恐怕连“隔靴搔痒”都难以做到;今天的融合性分析方法不仅使学生得以准确、深刻地把握这部传世名作,还能使他们对于弥尔顿写作的时代和社会获得清楚和全面的了解。需要指出的是,所谓交叉与融合并不是要求外文学者与学生在历史、宗教和哲学等领域进行专门研究,也不是在外国文学与其他文史哲诸学科之外开辟一门全新的、兼有各学科成分的专业——这样的活动本身并非不可,也很常见,但属于另一个范畴^①。这里所说的交叉与融合是以我为主、以其他学科与专业为辅而进行的本学科教学与研究,其目的是更为准确地理解与把握外国文学。显然,新文科并不会对外文学科造成结构性冲击,但对外文从业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方法与思路上的优化与改进,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方面进行拓展。

新文科战略下的交叉与融合并非仅涉及外文专业针对其他学科的“索取”,这种交流应该是双向的。我们这个学科同样能够为其他领域提供拓展研究方法思路的空间。回到弥尔顿的《失乐园》来说明这一点。这部史诗的一个焦点问题是:在一个一切悉由全能、全知的上帝创造并安排的世界里,人类是否拥有自由意志?前面提到,这是西方基督教社会反复争论的哲学与宗教话题,在弥尔顿生活的17世纪,这场争论具体表现为卡尔文教派的“得救预定论”和阿米尼乌斯主义的自由意志论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立场。荷兰神学家阿米尼乌斯创立的宗教思想派别以自由著称,反对卡尔文主义的严苛立场,认为人类的自由意志和上帝的主权可以同存共处。弥尔顿将《圣经·旧约》里的一段情节写成史诗来展示这一思想:对于撒旦可能实施的报复计谋,上帝曾一再警告过人类,亚当和夏娃在明知禁果不可食的情况下仍然选择屈从于诱惑,表明上帝的预先安排并不能排斥人类的自由意志,因而人类的堕落是其自由选择的结果。史诗将原本深奥枯燥的宗教教条以生动的情节展示出来,在效果上称其以一抵十也不为过。在这一意义上看,《失乐园》可谓对文艺复兴时代诗人兼批评家菲利普·锡德尼有关文学优越论所作的一个注脚。锡德尼在

其著名的《为诗一辩》中称,文学在教育读者的效果上优于哲学与历史,因为文学既不像哲学这般仅有枯燥乏味的教条,也不似历史那样为具体史实所局限,而能通过想象将一个道理以鲜活而生动的情节呈现出来,因此更容易为读者所理解与接受。

锡德尼当然有他作为诗人的偏见,但其所论并非信口雌黄。文学阅读固然无法取代哲学与宗教课程的作用,但可以成为一种非常有用的补充手段。文学作品的故事性和形象性便于学生理解哲学与宗教原理,其具体情节更有利于学生吸收原本需要死记硬背的道理。在这方面,19世纪的小说提供了一些更为有力的例证。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中产阶级全面控制社会,政府的执政理念体现的也是反映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功利主义。对于功利主义,非外语专业的学生可能会因翻译问题而望文生义,无法准确理解,甚至产生误解,而狄更斯留名于世的小说《雾都孤儿》和《艰难时世》不仅以其特有的方式展示了这一思想的基本内涵,还为读者提供了如何看待这种治理理念的态度与方法。与多数文学作品一样,狄更斯的小说在描写方面可能略显夸张,但对于何为功利主义,小说里的场景和人物对话能够为学生作出内容丰富并且充满色彩的诠释;关于这种思想对于社会可能产生的种种影响,一百多年来小说情节也给一代代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显然,锡德尼的长文并未穷尽文学在教学方面相对于哲学与历史的优势:文学作品的情节不仅能帮助读者理解思想,还有促使其反思、批评这些思想的作用。就狄更斯的上述两部小说而言,主人公经历的曲折甚至堪称悲惨的遭遇,足以让学生避免在意义层面简单地理解功利主义,而能对其各个方面尤其是社会后果进行深入的思考,从而在更深的层次上批判性地掌握这种思想。如此看来,相比于文学从哲学、宗教和历史等学科的索取,文学能做的贡献同样毫不逊色。

从外文专业的角度来看,新文科倡导的学科与专业交叉融合,简而言之,就是通过知识和方法方面的互相渗透,使现有的专业与学科更好地完成原有的教学与研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一成语,比较形象地描绘出交叉融合对于文史哲领域的益处。为充分发挥新文科战略的潜力,我认为有必要在教学管理层面进行相应的调整。比如,在选课政策方面复旦应该与世界主流大学接轨,进一步扩大跨专业选课的范围,使大多数学生能够选修其他院系开设的大多数课程^②。另一个同样重要且可以效仿的做法是,通过“一

课两号”的方式允许跨专业开课,即同一门课分别开设在两个不同的专业。比如,一门有关英国历史的课程,可以以专业课的形式用不同课号分别开设在历史系和英语系,这一安排将使英语系的学生获得其急需但在本系难以获得的历史知识。英语系的文学课程同样可以以此方式使历史系的学生以另一种途径认识英国社会。文史哲本不分家,跨专业开课不仅能使更多的学生受惠于一门课程,还可通过让不同专业的学生聚于一堂(指专业课,而不是公共课)这一方式,使其在课堂学习过程中同样实现交叉与融合。世界主流大学经常强调生源多样性,就是因为学生本身就是彼此最好的老师。

我们对于新文科的认识可能尚不完整,但无论复旦如何具体实施新文科战略,交叉融合必定是其重要内容之一。对于文史哲诸科中长期游离于圈外的外文专业而言,这是一次跳出井底、提高自身水平的绝佳机会。

注释

- ①这类跨专业、跨学科研究活动主要在研究性机构进行,在教学方面也主要体现在研究生课程中。
- ②仅将一些不适合外专业学生修习的课程排除在外,美国大学会将这类课程标为 majors only,即仅限于本专业学生修习。

新文科建设需要重拾人文教育的最初内涵

李宏图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目前教育部正在大力呼吁进行新文科建设,对此很多学者也都发表了很多宏论。在此,作为历史学科的教学研究者,写一点自己粗浅的看法。

对于新文科建设而言,首先要打破“文科无用论”。前些时候,中国人民银行的咨询报告甚至将今后大学招收文科生视为影响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估计持这一看法的人不少,实际上这是从近代以来“科学救国论”的翻版。从鸦片战争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华民族的历史主题就是救亡图存、追求富强。殊不知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仅要了解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还需要知道创造这些先进科学技术的动因在哪里,以及他们能够创造社会活力的社会体制是什么。近代思想家严复的思想转变历程就说明了这一点。他从最初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到最后认识到必须理解西方的文化,从而开始翻译密尔的《论自由》、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等开启民智的著作,成为著名的思想家。在今天的中国,其道理也是一样的。由此也涉及新文科建设的宗旨:我们不仅要在学术上追赶世界一流大学,更为重要的是要重塑民族的观念。要成为自由、民主、文明的国家,就必须在思想观念等人文层面了解自由、民主、文明等概念,进而进行我们自己的社会体制革新和制度构建。我们要有对人类社会命运的理解和担当。如果缺失了这

些,我们将不可能建成一个文明的社会。

大力发展新文科,如果从顶层设计的维度来看,还需要在学科建设、学术研究领域甚至招生名额方面予以大力支持,特别是要大力发展历史学科。在国外的很多大学,特别是一流的顶尖大学,很多学科都不招收本科生。学生先到历史学科就读,接受人文教育的学术熏陶和训练之后,再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相关的学科攻读研究生。因此,历史学科往往是学校的第一大学科,经过这一学术训练的学生,其素养也表现得很高。要发展新文科,首先就要解决优先发展什么学科的问题。如果对此没有清晰的定位,不能够对学科发展等相关联的一整套结构体系进行全面的审视与重组,而仅仅是一种号召和方向性的计划,恐怕无法达到新文科建设的预期。

与此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文科生的招生名额相对不足。最近读书时恰好看到两组统计数据。一是1986-1987学年德国(当时为西德)各专业的大学生比例:农业、林业和食品学占比2.6%,艺术、艺术理论和造型占比4.9%,医学占比7.6%,数学和自然科学占比15.5%,工程学占比20.7%,语言、文化和体育占比21.5%,法律、经济和社会学占比27.2%。按照中国的学科划分,理科占比46.4%,而文科占比53.6%。二是1991年-1997年英国文理科大学生的数量:1991-

1992 学年,理科生有 4.7 万人,文科生有 6.8 万人;1992-1993 学年,理科生有 5.4 万人,文科生有 7.2 万人;1993-1994 学年,理科生有 6.1 万人,文科生有 8.3 万人;1994-1995 学年,理科生有 7.3 万人,文科生有 10.3 万人;1995-1996 学年,理科生有 7.6 万人,文科生有 10.9 万人;1996-1997 学年,理科生有 7.8 万人,文科生有 11 万人。从这两组数据可以看出,在这两个国家(欧洲各国大体一致),大学生的人数是文科比理科多。考虑到近些年的发展趋势,两国文科大学生的比例还会提高。反观我国高校招生人数,依然是理科生远远多于文科生。根据前几年对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招生人数的统计,文理科专业的学生比是 1:6。尽管这几年文科专业的招生人数有所上升,但名额仍然不足,特别是历史学科的招生名额更是无法和国外一流大学相提并论。

就历史传统而言,中国一直是重视人文教育的国家。中国传统的人文教育不是单一化的学科教育,而是对人的整全性培养和综合性教育。“人文”一词最早出现在《易经》中。《易经》贲卦的象辞上讲:“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后来对“文”的解释有:“道德博厚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锡民爵位曰文,愍民惠礼曰文,经纬天地曰文。”孔子还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因此,人文教育、以文教化或文治教化就成为中国的文化和教育传统。由此可见,人文教育的内容和功能包括四个方面:个人的修养和道德品行;对国家的治理;与其他族群的关系;对他人的社会责任与社会的美德。在学科的设置上,中国古代有“六术”——礼、乐、射、御、书、数,古希腊有“七艺”——逻辑、语法、修辞、数学、几何、天文和音乐。这样的学科设置是一种大人文的教育,或者说是博雅教育。今天在学科上将文史哲学科视为人文教育,这样狭隘化的理解也就自然导致了人文教育与社会科学教育、自然科学教育的对立,似乎一谈人文教育就与这样的两个大学科毫无关系。从中国人文教育的传统来看,这是历史的断裂。新文科建设应该重拾人文教育的最初内涵,提倡大人文的概念,回归大人文的中国教育传统。

当然,回归传统并非不要更新,恰恰相反,这是一种接续历史的更新,是面向未来发展的回归。因此,提倡大人文和新文科建设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也就是要思考面对当今学科发展的需要,包括历史学科在内的文科应该如何进行转型。20 世纪 60 年代

以来,西方人文学科发生了巨大变化。仅以历史学为例,就发生了所谓的“文化转向”或者“语言转向”,不仅开始吸收人文学科中其他学科的营养,也开始广泛吸收社会科学,特别是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而带来了学科的新变化。如历史研究开始关注心态、象征、符号、仪式、修辞等,研究一个社会或者一个人如何建构起自己的想象和表征系统,这样就实现了从原来的注重研究自然的实体世界向研究建构的世界的转化。此外,多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已经成为一个发展趋势,如环境史、视觉史等,前者和地理学、生态学甚至植物学相结合,后者和艺术、博物馆学、景观设计、自然遗产保护等学科内容相结合。值得一提的是,历史学科和理科的结合,特别是运用数学工具也已经成为目前国际学术界的主流。例如我所认识的一些国外学者,在研究 18 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运用统计数据对启蒙思想家的思想传播进行了分析。

不仅如此,回归人文教育的传统,更为重要的是让我们的教育以“人”为中心。最近读到法国作家达尼埃尔·佩纳克所写的《上学的烦恼》一书。该书出版后高居畅销书榜首,一度被法国《读书》杂志称为“佩纳克现象”,2007 年荣获法国雷诺多文学奖。这本书叙述的是作者自己的故事。作者在上学时就是一个所谓的差生,用了一年的时间才记住字母 a。他听不懂课堂上老师在讲什么,发明各种恶作剧捉弄学监和老师,不做功课而编造各种谎言。久而久之,他对自己失去了信心,觉得前途无望,成了被既定的教育体制所认定的差生,并被抛弃在体制之外。在老师的教育下,这样的差生最终转变成了好生。这就告诉我们:没有所谓既定的差生,差生是被我们现存的体制和规范所建构的,一旦我们打破现有的桎梏,解放自己,我们就会有别样的行动,找到转化的路径。当然,这种转化需要教师富有耐心,理解和尊重学生,进入学生的世界并与其进行对话,而不是忽略、歧视甚至粗暴地干预学生的自我世界。由此,自然就衍生出教育的职责和功能这一问题。我一向认为,比起知识的传授,教育对学生人格的培养更为重要。要让学生成为“人”,成为一个文明的人。对于教育工作者而言,说通俗一点,就是要将学生当“人”待。实际上,学生是在人文教育而非说教中明晓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恶,什么是正义,什么是美德。而这几年大学里出现的很多无视人类基本价值观的现象,正好反衬出我们教育的弊端。在我看来,将人的权利、人的尊严与

人的价值置于新文科建设的首位,将是未来的关键之所在。正如法国思想家和政治家基佐所说,文明应该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一个是社会的发展,一个是个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指“国民生活的不断完善,严

格意义上的社会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发展”;而人的发展指“个人的发展、内心生活的发展、人本身的发展,人的各种能力、感情、思想的发展”。总而言之,文明是社会和人类的完善。

知识结构化转型与新文科建设

张涛甫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教授)

新文科业已成为国家战略,由教育部主导在中国大学推进。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学科和教育变革,其影响甚巨,但究竟构成怎样的影响,目前还无法预判。这要看各大学如何接棒,如何在各自的学科结构中破题,同时也要看教育主管部门如何持续发力,与大学如何互动,能不能形成良性的互动。关键要看各大学作为办学主体和知识创新、传播主体,如何释放能动性,积极作出应对,将国家政策议程与大学教育议程适配对接,让这场空前的教育改革和学科再造行动真正落地。讨论大学新文科建设,需要考虑启动新文科建设的当下语境,并从学科演化史的角度考察学科分殊逻辑和知识分化理路,在此基础上思考新文科建设如何破题,如何与大学教育和知识创新有效对接。

一、社会场景巨变催生知识逻辑转变

新文科概念的提出,是对既有学科体系的解构和颠覆。在知识世界,随着知识细分的发展,知识树的分支越来越多,学科分化越来越细,知识世界也被分割成不同的知识板块,每一知识板块隶属于一定的学科或知识分支。从早期的哲学和数学,到后来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几大部类,每一部类内部又有若干分支。各个知识分支内部又有一套知识逻辑。如此下来,知识世界的分区愈加细密,知识在细化的同时,也被建制化,形成稳定甚至板结的知识结构和逻辑。知识结构和体系被固化之后,可能会产生两种后果。一是不同板块之间的知识区隔被建制化,就会形成内卷化的排异性,对“他者”知识会产生排斥反应。这种知识排异不是出于“真理”逻辑,而是出于知识的权力逻辑。二是知识一旦固化、内卷、沉淀,就会按自身惯性和逻辑维系下去,依循自身的知识范式演化。这就造成知识对实践层面的变化失去敏感性,

以不变应万变,以僵化的知识应对外部变化。

当下的知识世界就面临这样的境遇:社会外部性的剧烈变化重置了知识生产场景,无论作为客体层面的对象物还是主体层面的对象物,均发生了深广的巨变。从客体层面上说,由于信息技术的过度扩张,技术创造出巨量的波德里亚所说的“仿真”镜像和景观,这些非自然景观充斥于自然景观和社会景观之中,衍生出纷繁复杂的人造景观。如何认知和处理这些非自然的第二现实?如何用原有的知识逻辑和理论框架解释新生的拟真社会景观?这些问题向知识界提出了空前的挑战。再者,新媒体技术重塑了人类的时间和空间经验。由于社交技术的赋能,人作为行动主体和交往主体,前所未有地克服了物理空间的限制,实现了交往的空间突破,重塑了人的交往关系,这也深刻影响了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能动性。更为关键的是,虚拟空间与实在空间的交互,让人的社会关系和交往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上述这些变化,远远超出了知识界的既有解释能力和能指范域。

以互联网、智能媒体为代表的“元技术”作为一种超级技术,彻底打破了传统媒介技术对于时间和空间的依赖,也打破了社会系统对技术社会化效应的刚性约束。强大的社会建构在“元技术”效应的深广影响下,社会的组织性和结构化开始解构,整个社会系统的既有结构和逻辑的有效性被大幅度稀释,开始新一轮的系统调适,孕育新的结构和系统逻辑。“元技术”推动了“新媒介”的不断出现,而“一种新媒介的出现不仅意味着信息生产方式的革新,也意味着围绕它的某种组织性和结构性的变动”(喻国明:《如何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传播场域中寻求有效的发展》,载于《新闻界》2021年第1期)。正如雷舍尔所言,问题域的增长率超过我们得到解决办法的能力。新媒介技术的活

性释放出巨大的解构和重构能量,全方位重构了社会系统,也重塑了人类本身。如今存在一个突出的现实:知识外部性的巨变与知识界相对滞后的知识供给形成了甚大的反差。知识更新的速度远不及社会外部性变化的速度。知识界还在按既有的惯性、范式运行,按照既存的知识割据体系从事知识生产和传播。在这种关键时刻,提出“新文科”的构想对于打破现有知识结构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二、文科:其本在人

我们讨论“新文科”,意在往前看。其实,要把文科建设成“新文科”,往后看也很重要。只有看清来时的路,才能看清当下的历史方位,确定向前看的方向。

回望人类知识发展史,从本源上看,原先的知识是整体性的,没有文科和理科之类的分野,所有知识都是基于对对象化世界的好奇和认知。进入近代以后,随着自然科学的崛起,以物理学为先导和成功典范的近代自然科学在17-18世纪形成了关于科学知识及其研究态度的典范模式。科学认知不再是无所不包的、整体性的、本体性的,而把重心聚焦于自然科学领域。近代以来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转而以特定的、有限的局部为对象,放弃了此前无所不包的终极真理抱负。在方法论上,科学研究遵循主客体二元论。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分立并保持距离,研究主体不与研究对象发生情感或评价关系,仅仅客观地认识对象。皮亚杰认为,物理学是自然科学的典型样本。物理学观察对象时,可以把对象看作是相对独立于主体的。物理学的全面历史就是一部非中心化的历史,它把以自我为中心的主体所造成的歪曲减到了“最低限度”,使物理学“最大限度”地听从了认识主体的规律(让·皮亚杰:《人文科学认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到了19世纪下半叶,自然科学趋于专门化与职业化,方法论逐渐成熟,知识也更成体系,形成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自然科学有瓜熟蒂落之势,于是就从整合的知识版图中分流出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谱系。科学的伟大成功所依靠的方法,只能应用于那种可以被清晰地观察与精确地测量的现象,而人文与艺术在传统意义上的对象——信仰、价值、情感、对艺术的反应、人类经验的模糊性,以及社会互动的复杂性,却不是可以轻易地通过这种方法进行研究的(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群言出版社2012年版,第180页)。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重要区别在于,自然科学是靠实验科学支撑起来的,其所有科学假设的验证都需要借助实验去落定。近代唯科学主义扩张,其极端是不仅将客体世界物理-机械化,而且将作为主体的人也物理-机械化。英国经验派哲学家霍布斯认为,人体是一只钟表,“心脏不过是发条,神经不过是些游丝,关节不过是些齿轮”(尤西林:《人文科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与自然科学不同,文科关注的问题与人密切相关。把对自然界的认识无条件地置换到对人和社会的认识,这种自然主义和唯科学主义偏向是需要反思的。物质世界可以通过自然科学进行研究,但精神世界只有通过人文研究才能抵达。尽管精神和情感同我们的身体以及生活环境的物质秩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我们也相信生命科学将会通过遗传学与脑科学的研究使人们越来越清楚其中微妙的作用机制,但人的意识不能被简单地还原为同其所依存的生理载体的关系,还有一种可以称之为灵魂、精神、心智、思想或者意识流的东西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看,还是应该将人的意识视为一种过程,而不是一个客体——它不是可以简单地还原为它所依据的物质与社会环境的。在自然界之外,还存在着一个人类所参与的第二维度——人类的“文化世界”,其中包括思想、价值、信仰、艺术、语言、象征、神话、制度和历史等诸多方面。它的特点是通过人文科学的方法,从内部对其进行了解——因为它本身是由人创造出来的。文科所认识的对象要比自然科学复杂得多,因此,文科有其自身独有的方法论。由于文科以从事无数活动的人作为研究对象,而同时又由人的认识活动来思考,所以人文科学处于既把人作为主体又把作为客体这样特殊的地位(让·皮亚杰:《人文科学认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第180页)。

文科中的社会科学采取的是准科学的知识生产范式。社会科学把人类社会作为认知对象,即把人类社会对象化,具体表现为对宏观结构和现象的认识,也包括对微观行为和问题的研究。其中的典型代表是社会学。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遵循同其他一切科学类似的研究方法。社会学的基础是观察现象,并试图描述、解释,直至预见并影响这些现象。社会学的理论化和形式化几乎都是搬用自然科学中的理论化和形式化,当自然科学中的这种做法本身成为实在的、可靠的方法时,在社会学中也会如此,但不一定必然如此,因为社会现象同物理现象或生物现象的根源

不完全一样(莫里斯·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第180页)。20世纪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在将人的心理研究客观化与测量化等方面更趋自然科学化,将人的内心意识客观化。这种社会学知识生产范式同样忽视了社会学的核心问题——人的问题。我们对人的认知和理解,不能亦步亦趋跟着自然科学跑。文科必须回归对人的主体性的关注。今天我们提出新文科的理念和构想,须反思人类知识生产中的泛自然主义和唯科学主义偏向。

三、新文科 如何打开?

知识是问题刺激的产物,但这种刺激不是简单的镜像反映,而是知识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经由复杂认知过程的智性产物。当今知识生产所处的问题域迥异于此。问题域的空前复杂化引致知识形态和结构的变化,刺激知识生产范式的转变。互联网新媒体技术引发的革命性影响全方位改变了人类的交往方式,重置了人类社会的景观和关系结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由新媒体技术革命所引发的交往革命和关系再造深刻而广泛地影响了人的社会关系总和。文科研究是围绕人的活动展开的,无论人文学科还是社会学科都应以人为中心和重心。现今,我们研究人的行为(包含交往行为)所面临的难度空前之大。

我们考量新文科,首先需要重启文科的初心,回归对人的关注,回归对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关注。新文科须纠正泛自然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的偏向,反思科学主义的傲慢与偏见,让文科回归文科。应从文科的本体性角度,重新考量人的社会性以及社会关系总和中的人。既要把人对象化、客体化,又要尊重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从而找到文科自身安身立命的位置。

其次,重新考量学科的边界,反思不同学科之间的边界。借助学科交叉,催生新知,孕育知识新范式。

问题域的巨变引发知识的聚变和裂变,孕育、催生新的知识范式。既然总体性社会现实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那么知识生产的内容和形式也应随之改变。眼下到了知识范式蝶变的关键时刻,不同学科之间的边界出现融合和新的分合。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成为必然的趋势。新问题的出现,刺激新知的临盆。很多新问题突破了既有的知识边界和学科范域,若固守既有的学科边界,知识与研究对象的适配性和“逼真度”则会严重受损。新问题的涌现呼唤知识的创新,而知识创新仅从内部突破往往是不够的,须跳出既有的思维框架和知识范式。学科交叉是刺激知识创新的重要路径,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互动会刺激新知的出场,进而促成新范式的问世。文科可从这个层面上重启,借此打开簇新的界面。

其三,在这场空前的知识革命中,新文科不可能独善其身。新文科涉及的知识格局和范式转变,其影响势必超越文科的边界,涉及整个知识界的大盘调整和结构转型,进而引发整个知识界的范式革命。有新文科,自然有新理科、新医科、新农科,等等。从事新文科建设,仅靠文科单向发力显然不够,需要整个知识界的集体行动。只有共同努力,方可完成这场伟大的知识革命。

其四,新文科建设不仅要解决知识自身的问题,还要解决知识之外的社会问题。所有的知识都受制于社会场域。知识的生产以及效用往往是条件性的,这里的条件包括社会条件以及人的主观认知条件,而文科对于社会条件的依赖会更大。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考量,知识不是透明物,而是附着于社会场景的。与自然科学相比,文科不可能拔除价值倾向和意义矢量,达致纯粹的客观、真确。其知识效度都是条件性的,即受到外在条件的约束。这就要求我们在从事新文科建设时,尽可能考量知识生产和传播的社会性条件。新文科建设,需要从知识的社会性条件角度多加思考和用力。